

李范文 主编

西夏语比较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前 言

1916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劳弗尔(B. Laufer)提出西夏语属西(Si) - 保(Lo) - 么(Mo)语支(即彝语支)。1932年,俄国西夏学先驱聂斯克(H. A. невский)认为这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1981年孙宏开教授认为西夏语与羌语比较接近,他提出西夏语是否属于羌语支?西夏语究竟属于何种语支,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0年我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西夏语比较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得到批准和资助。

为了联合攻关,我邀请有关专家参加,他们是四川阿坝师专的林向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孙宏开教授、聂鸿音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语文学院马忠建副教授(西夏学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罗矛昆教授、杨占武副教授。先由孙先生选出1500个单词,由林先生注嘉戎语音,李范文、罗矛昆、杨占武等负责查《番汉合时掌中珠》、西田龙雄的《西夏语研究》、索夫罗诺夫(苏敏—M. B. Софронов)的《西夏语语法》、史金波等的《文海研究》、李范文的《同音研究》等各家拟音,供孙先生写词汇比较时参考。

为了全面反映目前国内藏缅语族各语支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994年元月,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教授的支持下,邀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彝、羌、藏、缅、景颇等语支的有关专家进行座谈,以便听取各方面的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集思广益,更好地完成这一课题。参加座谈会的有马学良教授、胡坦教授、王尧教授、戴庆厦教授、孙宏开教授、张公瑾教授、黄布凡教授、李宗耀教授等以及西夏语方面的马忠建、聂鸿音、李范文等教授参加座谈。本课题根据个人所长,作如下分工:

李范文写第一、五章;

聂鸿音写第二章;

马忠建写第三章;

孙宏开写第四章。

附录中劳弗尔的论文由聂鸿音、彭玉兰译，王尧、王启龙校。论文提要由聂鸿音译。

本课题独立成章，自成一体，基本上保留了作者的原稿面貌。

当我们的课题完成后，我们请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戴庆厦教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领导小组组长、著名民族语言学家王均教授，以及宁夏语言学会会长、语言学家、宁夏大学的高葆泰教授鉴定。他们在百忙中拨冗审阅，予以充分肯定，还为本书赐序，特别是马老，年逾八秩，抱病审稿；王老不顾出国刚归之疲劳；高先生尚在医院治病；毅然为本书写序。他们这种精神怎不令人感动！

出版这类专著，如何处理西夏文字是研究西夏学的学者十分头痛的事，有的书因此长期出版不了。本书同样遇到这一问题。当我们历经艰难解决了这一问题后，又发现如此多的西夏字，读者需检阅某字的语法功能时，感到茫然，犹如海底捞针。为此我又日益继夜地编西夏字检字索引，如果按笔画部首编，既费时间又难检索。只好利用仿汉字四角号码而编的西夏字四角号码检字法来编排。读者如懂汉字四角号码检字法，十分钟内即可学会它。

本书原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新任社长李树江教授得知后，动员我拿回宁夏由他们出版。他对有关宁夏地方特色的专著独具钟情。他的思想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征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意，于1998年10月将软片拿回宁夏。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郑文林、综合编辑室主任周用宜、副主任任明等同志，多年来对我的热情支持和理解，我再次表示感谢！我也深深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李树江、副总编辑王文庆，政史编辑室马洪真、汤晓芳、王立平等同志，他们将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

由于作者不在一个地区和单位，未能充分展开讨论，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范文

1998年11月2日

马 序

李范文教授主编的《西夏语比较研究》是一部集国内知名的西夏语文学者、史语学者和语言学者的中青年专家,各以其多年专精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语言比较的专著,立论精确、详略得当。承范文学友送示校本,得先睹为快,耳目一新,为之大喜。喜绝学不绝,后继有人,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回忆我初次接触西夏语文是在40年代初,初进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在李方桂师指导下研究彝语,我读的第一部启蒙参考书就是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这是我国当时应用语言科学方法系统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第一部有开创性的鸿篇巨制,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奖誉。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关于西夏语文的调查考证论述,成绩斐然,我国中青年专家人才辈出,本书作者就是其中后起之秀,他们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论文专著,不但可与国外论著并驾齐驱,有些已是超越前贤后出专精之作,尤其这部近著《西夏语比较研究》算得是西夏语文的荟萃之作,也只有在这类精萃论著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如此正确的比较研究的结论。如书中对西夏语的支属问题,自本世纪之初美国著名言学家劳弗尔(B. Laufer)提出西夏语属为今彝语支语言,自是中外学者认为这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我国学者积多年实地调查与西夏语有关语族、语支的语言的第一手材料,经大量语料,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提出新的论点,虽不能遽下定论,但对西夏语属的研究必将出现精益求精的论据。他对有关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在精确记录的语言材料上做出精密科学的分析论证,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这是一部继往开来高水平的科学论著。

马学良

1995年5月19日

王 序

我国党项羌人李元昊 1038 年建立了国号“大夏”的封建王朝,以现今宁夏和甘肃为中心,先后与北宋、辽以及南宋、金成鼎立之势,历时 190 年(1038~1227)。宋朝称大夏为夏国。在其建国以前,采取汉字的笔画及结构体势,创造了西夏文(旧称“蕃书”),1036 年颁行,夏亡以后仍旧有人使用。但是后来随着党项族历元、明两代逐渐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这种文字也就慢慢地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本世纪经过多国学者的探索和剖析,特别是晚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外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使西夏语文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西夏文约有六千多字。在大量的西夏文文献中,有各种类型的辞书,其种类之多,水平之高,堪与汉文辞书媲美,这对西夏文的解读很有裨益。还有大量法律、历史、文学、医学及官私应用文书,有不少译自汉文的典籍和数量很大的西夏文佛经(译自汉文或藏文),以及碑文、石刻、题记、印章、牌、币等等。^① 总数约有数百万字。文献如此丰富,说明西夏文使用之广泛,它反映了高度发展的西夏文化,是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献语言。另外,由于境内除党项人外,还有汉、藏、契丹、回鹘等族,西夏文里的汉语藏语借词,对于语言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无怪乎尽管西夏文的解读难度很大,西夏学仍然成为本世纪一门颇有吸引力的国际性专门学科。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西夏文既已不复使用,那么它所记录的语言也只能是它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称它为“西夏语”。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13 世纪党项人的后裔因已同化于其他民族而失去了自己祖先原先使用的语言。但是,就好像《广韵》所记录的汉语不能不有别于现代的任何汉语方言一样,应该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 13 世纪的西夏语,经过七百多年的演变,如今已经在语音、语法、词汇上同当年西夏王朝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致难以确认现今哪种语言是昔日西夏语的后代;或者,原先的方言后来又已发展成为不同的语

^① 详见史金波《西夏文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 152-158 页)。

言。总之,根据不同时期或地点西夏文的资料重拟出来的音系,可能有所出入,这也不足为怪。这反映了所据资料的时代或地域特点;它们同当时的西夏语方言发展而成的现代语言,必然又会有更大的差异。但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把从西夏文资料构拟出的音系,抽绎归纳出的语法特点,以及西夏文献中的词汇,拿来同现代同系属语言、语法、词汇进行比较,应该有可能就11至13世纪西夏语在语言系属分类表中所处的地位,得出有科学论据的结论。《西夏语比较研究》就是为西夏语的语言系属问题进行定位论证。本课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0年资助立项的课题。本书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项目负责人(亦即本书主编)西夏文专家李范文教授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受业于马学良、于道泉、林耀华教授。1959年研究班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为了揭开神秘的西夏王国之谜,他主动要求到西夏王国的故地宁夏工作,埋头研究西夏文史30余年,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在西夏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有资格,有能力负责主持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

课题合作者之一孙宏开教授,从1956年起,就从事藏缅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经他调查写成专著的 language 有30多种,发现新语种10多种。他是第一个提出在藏缅语族中应单列出羌语支,并具体列举羌语支的特点和应属这个语支语言名称的第一人。

在1986年前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和语言文字卷时,编辑组曾反复讨论在“藏缅语族”中是否要把羌语支放进去;后来考虑到百科全书只能收进学术界已有定论的东西,而当时从事这些语言研究的人员和已出版的专著还不够多,所以暂先没有把羌语支分列出来。但是嗣后研究的学者和论著渐多,孙氏的论点为国际语言学界所接受。现在,关于羌语支在藏缅语中的地位已可确定。孙氏认为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比较接近,也基本获部分同行的首肯。但是,西夏语属羌语支这一论点的确认,还需大量语言事实的论证。孙宏开教授参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行列,承担了词汇比较的任务。前此他已参加并主持了收有34种藏缅语1004个常用词比较成书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的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他来参加本课题词汇部分的编写当然是很合适的。

本课题另两位主要参加者聂鸿音副教授和马忠建副教授,过去我同他们虽无个人接触,但我拜读过鸿音同志的多篇论文,对他的治学功底与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具慧眼的分析力,很是佩服。忠建同志也是著名西夏学老专家王静如先生的高足。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西夏语语法研究方面的专题,

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自不待言。

由这四位专家来合作完成《西夏语比较研究》这一宏大课题,当然是很合适的。

正如课题负责人李范文教授所告诉我们的:在课题组织方面,经多次讨论,确定写作提纲,然后根据个人专长,承担各章,当工作告一段落,需进一步深化,集思广益时,他走访请教有关专家,然后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藏缅语族各语支的专家座谈讨论,再由四位专家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定稿。最后各章基本上保留原稿面貌。我认为这样做是慎重而得当的,体现了学术民主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学术界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我阅读了本书的校样。虽然我对西夏文是外行,所述未必中肯,但经过粗略地通读全稿,我认为,就研究过程中紧密的联系,论证材料的丰富和比较方法的缜密而论,完成的项目是高水平的。

第一章绪论,对西夏文研究的回顾全面扼要,而在篇幅很大的注释中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资料,信息量大,弥足珍贵!

第二章语音比较。我同意作者的观点:要真正明确地看出西夏语的发生学系属,还要仰仗语法和词汇的比较结果。但语法和词汇毕竟要通过语音的形式来表达。因此,作者首先回顾了前人对西夏文拟音的情况,于评介中见功夫。他提出了在具体拟音之前要解决的一些总体性的问题。他就与比较研究有关的西夏语音基本特征六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将西夏语与同系属语言作了比较,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后通过所讨论的语音问题分为三个层次,从中得出西夏语与羌语支最相近的初步结论,并指出尤其与羌语南部方言以及木雅、纳木义、史兴、尔龚等语言更为接近。王静如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西夏文”条里说:“西夏人自称‘弥’(mi),古代藏人称之为‘弥药’,今称‘木雅’”,如今在语言比较中(语音、语法、词汇)得到了论证,尽管七八百年前的西夏语与现代的木雅语等尚有相当的距离。

第三章语法比较。通过15个专题,分别先从西夏文献分析描述西夏语中这些语法范畴的形式和功能,然后同所见到的30多种藏缅语的语言(方言)相比,按语支分别列表或分别论述,并分析其中的同源或异源关系,通过细致的比较,说明西夏语与各语支的关系远近,最终得出结论(见本书252-253页)。本书主编李范文教授说,“这一章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西夏语法论著中最全面的专论”,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章词汇比较。在阐述西夏语词汇的一般特点以后,比较了30个语义范畴120个常用词在西夏文汉字注音及两种拟音与30种语言之间的异同;又

分析了西夏语和国内藏缅语族主要语支同源词的几个层次,这一部分参加比较的词数各有八百左右(西夏语是845个词),分别统计了它们同源词的百分比,从而说明不同层次的同源词明显反映语言间的接近程度。每一部分不仅有实例为证,而且逐词讨论,词汇量大,比较的面大,而且颇见深度。因此,得出的结论“西夏语是羌语支中介于南支和北支之间的一种语言……”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了。词汇论证的结论,也与语音、语法的论证相吻合。

第五章结论,与第一章的后一部分相呼应,提出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也是作者多年思考,通览诸家研究成果,反复酝酿后提出来的。做学问正是要完成前一个课题就得想到下一步,胸有全局,步步深入。作者写道:“印欧语系的研究历史已有200多年,对藏缅语族的研究,在我国是从30年代开始的,80年代才有长足的进展,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对西夏语的研究,亦是如此,尚处在‘初级阶段’,大量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绝不能满足于我们已取得的成就。”我很欣赏作者这种永不满足的态度。不过,就本课题的立项意图而论,我认为,在四位专家的协同努力下,通过不同方面的论证,不谋而合,得到一致的结论,可以认为这是西夏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果。我们欢迎这一研究成果的问世,我们期望西夏学在中外学者们的团结努力下,繁荣昌盛。是为序。

王 均

1995年5月于北京

戴 序

由李范文先生任主编,孙宏开、马忠建、聂鸿音诸先生参加编写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一书,是一部有功底、有水平的藏缅语语言学研究专著,其出版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件大事。

《西夏语比较研究》主要通过西夏语与藏缅语其他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广泛揭示西夏语的特点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本历史比较语言学专著。这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已经逐步进入一个比较深入的新阶段,说明藏缅语学者在研究藏缅语中已从零星的、局部的语言比较转入系统的、全面的语言比较。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藏缅语研究,我深深感到西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是非常不易的。因为,真正运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方法来研究藏缅语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时间很短,而且其间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本世纪初,人们对藏缅语所知甚少,大部分语言还未被认识。被誉为藏缅语研究“奠基之作”的《藏缅语言学纲要》(Outline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Stuart N. Worfendon, 1929),仅只包含少数一些中国藏缅语。中国藏缅语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30年代至40年代的拓荒时期。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藏缅语进行了一些语言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些描写语言学著作。二、50年代至60年代的语言普查阶段。在为中国少数民族创制、选择、改革文字的任务带动下,对中国藏缅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藏缅语材料,大体弄清了中国藏缅语的情况,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语法纲要和专题论文。这一时期是中国藏缅语研究的基础建设阶段。三、70年代至今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对藏缅语的共时描写比以前深入,揭示了许多过去尚未被认识的语言现象。与此同时,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探讨语言历史演变的论著。研究藏缅语的学者们已不满足于对语言现状的认识,而要进一步认识其发展演变。因为只有认识藏缅语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藏缅语的现在及未来。但是,由于藏缅语分化的情况相当复杂,而大多数语言又缺乏反映古代语言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加上对藏缅语的共时研究还很不充分,因而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

究,从总体上看还不是缓慢的,只是在部分特点上(如声调、复辅音声母、松紧元音、量词等)有所进展,比较系统、全面的语言历史比较还做得不多。《西夏语比较研究》对语音、语法、词汇以及系属等方面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历史比较研究,应该说,这在藏缅语历史比较研究领域开了一个好头,是值得称道的。

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至今所做的工作只能说还是初步的,有大量的课题尚未触及。藏缅语语种多,分化复杂,能为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丰富的原料和课题。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对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乃至丰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预测,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在今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能够不断出现新的局面,其成就将会大大改善藏缅语研究的面貌。《西夏语比较研究》这本专著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西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而且对整个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夏语比较研究》的作者都是国内外知名的西夏语或藏缅语研究的学者。他们各有所长,紧密合作,保证了课题的质量。主编李范文教授是我的同窗学长,在语言学、民族学等领域都有深厚的功底,对西夏语的研究成绩斐然,由他主持这一课题是很合适的。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是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因而合作攻关是一种易出成果的好方式,这值得在藏缅语研究中提倡。

戴庆厦

1997年1月31日

高 序

由李范文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西夏语比较研究》，全书共五章，60余万字，是一难度极大的课题。

1916年，由美籍德人劳弗尔(B. Laufer)提出西夏语属西(Si)—罗(Lo)—么(Mo)语支(彝语支)。1932年，俄国学者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认为这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它奉为“经典”。80年代初，随着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发现西夏语与羌语支比较接近，但是由于西夏文字比较难学，世有“绝学”之称，对此，无人问津。1990年，李范文教授在他完成西夏文《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两部巨著后，组织国内有关这方面的专家大胆申报并杰出地完成了这一重大课题，拜读书稿，令人钦佩不已。它不仅全面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而且对西夏语音、语法、词汇等作如此深入比较研究，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集中外西夏语研究之大成，资料之丰富，无与伦比。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语支在语音、语法、词汇上进行细致、深入地比较研究，从而得出西夏语属于羌语支，而非彝语支。尽管这是作者的一致看法，但他们对劳弗尔的观点仍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劳弗尔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早在20年代得出如此结论，披荆斩棘，功不可没。90年代能完成这一课题，亦是理所当然。这充分显示了作者不仅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有学者的胸怀和气度。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书虽然有的章节略显单薄，如语音比较，但其内容仍很充实，只是与其它语法、词汇比较而言罢了。

高葆泰

1994年11月5日



1994年元月，邀请藏缅语族有关专家学者座谈，这是参加座谈会的合影。前排（自左至右）孙东升、李范文、哈经雄、马学良、王尧、胡旦；后排：范慧娟、费布凡、张公瑾、戴庆厦、李宗耀、马忠建、聂鸿音。

目 录

前 言	1
马 序	3
王 序	4
戴 序	8
高 序	10
第一章 绪论——西夏语研究回顾与展望	1
第二章 语音比较	19
(一)西夏语音研究概述	19
(二)西夏语音研究的新课题	29
(三)复合元音问题	33
(四)松紧元音问题	36
(五)鼻化元音问题	39
(六)卷舌元音问题	41
(七)辅音韵尾问题	42
(八)声母发音部位问题	45
(九)声母发音方法问题	47
(十)语音小结	48
第三章 语法比较——从语法比较看西夏语的支属问题	50
(一)西夏语结构助词之比较	50
(二)西夏语名词数范畴之比较	71
(三)西夏语动词重叠之比较	81
(四)西夏语动词趋向范畴之比较	92
(五)西夏语存在动词类别范畴之比较	103
(六)西夏语人称代词之比较	115
(七)西夏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和数范畴	133
(八)西夏语反身代词之比较	147
(九)西夏语和藏语合成数词构成方式之比较	160
(十)西夏语构词词头? a 之比较研究	176
(十一)西夏语构形词头? a 之比较研究	195
(十二)西夏语和藏语动词使动态之比较	207
(十三)藏语疑问代词重叠之比较	223
(十四)从数词、量词、名词、动词的结合形式看西夏语与藏语诸语支语言的关系	230
(十五)值得商榷的问题——西夏语动词有没有时范畴	244
(十六)小结	254

第四章 词汇比较——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的历史地位	256
(一)西夏语词汇的一般特点	256
(二)若干语义范畴的比较	264
(三)西夏语与藏缅语族及主要语支不同层次的同源词	321
(四)小结	340
第五章 结论——关于西夏语研究的几个问题	345
(一)关于西夏语的支属问题	345
(二)关于西夏语的鼻冠音问题	346
(三)关于西夏语的轻唇音问题	347
(四)关于西夏语的舌上音问题	348
(五)关于西夏语松紧元音问题	348
(六)关于西夏语的韵母问题	348
(七)关于西夏语的语法问题	350
(八)关于西夏语的词汇问题	350
附录:《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	352
导 言	352
数 词	356
西夏语专名词分析	358
第一组 印支语共有的词型	358
第二组 直接来源于彝语或么些语或这两种语言,与藏语或汉语或这两种语言有着进一步的第二层亲属关系的词	364
第三组 与彝语和么些语相近,而与藏语和汉语没有对应关系的词	375
第四组 与台语相关的词	377
第五组 与汉语相关的词	378
第六组 与藏语相关的词	379
第七组 存疑词例	380
第八组 西夏语独有的词	382
第九组 专名语词	384
第十组 借词	385
西夏语植物补述	390
西夏语音韵学	394
词法特征	398
句法特征	398
结 语	399
英文提要	417
西夏文检字索引	423

第一章 绪论——西夏语研究回顾与展望

“你在大漠穿行 30 天之后,如我所说,便会在其东北和东部之间,找到一座名叫‘沙州’的城,该城属于大汗,坐落在人称‘唐古特’的地区。人们大多崇拜偶像,其中也有景教、基督徒和萨拉森人。崇拜偶像的人们讲一种独特的语言,不经商而以农为生。”这便是马可·波罗所著有关伟大的唐古特地区一章的开头。尤勒认为,这种“独特的语言”正如劳于曼估计的,可能是藏语;而另一方面,他曾倾向于认为马可·波罗提及的这种语言是一种汉语方言。现在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马可·波罗肯定是谈到了西夏语,并且从我们当前手中这种语言的残卷以及后面的讨论判断,他称这种语言是“独特的”,这简直千真万确。这种语言真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只不过不像劳于曼和另几位研究者所说,仅仅是单纯的藏语,而是藏缅语言大家族中独立而特殊的一员,初步表明它与保保和么些语组有确定无疑的亲属关系。^①

这就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劳弗尔(B. Laufer)于 1916 年发表在《通报》上的一篇著名论文——《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导言中一段极为重要的引言和结论。1932 年俄罗斯著名西夏学者聂斯克(又译聂历山、聂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在其《西夏语研究小史》一文里认为劳弗尔确定了西夏语在印支语中的地位,而把西夏语与保保语、么些语三者联系起来,确定为一语支,即“西—保—么”(Si-Lo-Mo)语支,并认为这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②。

西夏是公元 1038—1227 年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党项羌原居住在今甘肃、青海、四川接界地区,它是吐蕃族系的一支,犹如今天的嘉戎、木雅、普米、扎巴一样。公元 7 世纪时,吐蕃在康藏高原上建立起奴隶制政权,党项不堪其统治,请求内徙,唐朝政府准予内迁。从此党项人大批迁徙至今甘肃庆阳、陕西横山一带。居庆阳者号曰东山部,居横山者号曰平夏部。公元 881 年,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逼进长安,僖宗潜逃,唐朝危在旦夕。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众助唐,因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而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那时起,党项“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③。公元 1038 年,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等。公元 1227 年被蒙古主成吉思汗灭亡,历时 190 年。如果从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 347 年。这要比北宋(960—1127 年)和南宋(1127—1279 年)加起来还多 27 年。所以劳弗尔称唐古特地区“是一个伟大的地区”。它不仅地区伟大,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夏文化,为世界文化史增加了辉煌一页。

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会引起世界学术界的瞩目。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西夏语的支属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西夏灭亡后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情况。

公元1036年,西夏建国前夕,已经创造了西夏文字。“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译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④。这种文字何时停止使用?从现存的西夏文佛经来看,直到明朝“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还有西夏文经刊印出版”^⑤。即西夏灭亡之后还流传了二百多年。如果从民间遗留下来的西夏文碑刻来看,河北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则有“大明弘治十五年”^⑥(1502年)的记载,即西夏灭亡275年后还使用这种复杂的西夏文字,可见这种文字是多么受人尊重啊!

中外学者对这种文字的研究,还是从近现代开始的。

我国学者对西夏文的研究是从1804年开始的。甘肃学者张澍于公元1804年首次发现凉州感应塔西夏文碑,他把西夏文与汉文对照,识出“天祐民安五年”等字。1837年,他在《养素堂文集》第十九卷中写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第一次将他发现的西夏文字介绍给读者。

外国人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比中国学者晚了近一个世纪,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碑文开始的。1870年欧洲人伟烈亚力(A. Wylie)把西夏字误认为是“女真小字”^⑦。1895年,法国人蓬拿帕特(P. R. 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的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Documents de l'Epoque Mongole)。同年,英国人布谢尔(S. W. Bushell)研究十二枚西夏文钱,考释出三十七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⑧。法国人沙畹(M. Ed. Chavannes)和伟烈亚力发表了若干西夏字音,但其字义仍然茫然^⑨。

1898年,德维利亚(Mr. Devéria)发表了论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凉州大云寺感应塔碑文^⑩,明确指出此碑为西夏文碑。从此这块西夏文碑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虽然这要比张澍发现著文介绍晚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在闭关自守的旧中国,学者们的发现或研究成果,往往束之高阁,难以与读者见面。

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M. G. Morisse)在北京买了三卷来历不明的西夏文译本《妙法莲华经》,经他研究,写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初步成果》。他首次对西夏语法作了初步研究,指出动词大率在一句之末,宾语在动词之前,形容词有时在所欲形容者之前,有时在后,以谐和之声音指示之。这是毛氏第一个对西夏语语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今天看来仍有一定意义^⑪,是一篇卓越的论文。

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从摸索到有科学依据,这是一个飞跃阶段。这个阶段应该从公元1908年开始的。1908年3月,俄国地理学会派沙俄大佐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来我国西部探险,并首先发现了西夏遗址——黑水城(哈拉浩特)。1909年5月,柯氏从西藏返回黑水重新发掘这座古城时“送给探险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⑫。同年彼得堡大学副教授伊凤阁(又译为伊万诺夫—А. И. Иванов)从这些文献中首先发现夏汉对音对义双解手册《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在《帝俄科学院院刊》上撰文介绍^⑬。1920年,阿列克赛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著文介绍柯氏在黑水城考古发掘。他说:“中国所谓西夏(1032—1227)的一支,西夏文书籍数以千计,这种文字还未能完全读通,其文献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⑭。聂斯克曾有一刊布这批文献的计划,他说:“刊布柯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哈拉浩特(黑水城)出土的材料,至今几乎尚未能提供学术界使用”,他感到很遗憾。他认为“我们的藏品在数量上的丰

富或内容的多样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⑩。可惜这批西夏文献出土半个多世纪,并未及时公之于世,不能不说是一憾事。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于西夏乾祐庚戌二十一年(1190)所著,1909年伊氏介绍并附了他所拟测的读音,引起了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B. Laufer)的极大兴趣。1916年,劳氏根据伊氏介绍的资料,选了210个单词,以他渊博的语言学知识,写了《西夏语支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一文^⑪,对西夏语作了初步研究,得出了著名的“西(Si)一保(Lo)一么(Mo)”语支的结论。

劳弗尔是受过传统语言学严格训练的,他尽量沿着经院式的道路来探索西夏语的源流,首先从最基本的数词开始,同藏语、嘉戎语、彝语、么些语、仲家语、苗语以及缅甸语、克伦语、长米语、卢舍依语、米佑语、米什米语、拉龙语、伽罗伽派古里语等进行比较,继而而对西夏语词汇进行探讨。他认为西夏语与藏缅语的同源词有三种类型:一、印度支那语共有的同源词;二、与彝语、么些语、汉语、藏语四种语言的同源词;三、只与彝语、么些语同源,而不和其它语言同源的词。这一类是全文的关键,也是全文最精采的部分。为了区别同源词和借词,对借词的考证亦十分精彩,其中对印度、亚利安、西亚诸语借词的论述,显示了作者渊博深邃的语言历史文化素养。

遗憾的是伊凤阁当时对《掌中珠》的复字注音并不了解,西夏人的读书写作习惯是从右到左,而伊氏则按西方人的读书写作习惯自左至右,致使他把“鱼骨”、“尼足”、“尼卒”、“泥六”、“尼谷”、“尼追”、“尼窄”、“蛭移皆”、“蛭则”等等,误读为“骨鱼”、“足尼”、“卒尼”、“六尼”、“谷尼”、“追尼”、“窄尼”、“皆蛭”、“则蛭”等等。甚至把男女之男误为女。这虽然在劳氏文章里仅占极少数,但他的依据是错误的,影响了其论文的科学性,“不免有流于臆断之处”。但这毕竟是枝节问题,他对西夏语如此精辟的论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由于《掌中珠》的出土与公布,西夏文之谜终于揭开,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一部接着一部问世。1919年,我国罗家父子(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旅居日本,罗氏兄弟的著作同时问世。罗福成依据毛利瑟刊布的《莲华经》以及日本羽田亨先生所藏河内远东学收藏的西夏文《莲华经》卷七照片,编辑翻译手写影印出版,名曰《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其弟罗福苌同时出版了《西夏国书略说》。据西田龙雄介绍:这是一本小册子,内容为书体、释字、文法及遗文四项,简明扼要,当时成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最高学术著作。他考证出11种部首,“开了部首研究之先河”^⑫。可惜罗氏英年早逝,无不痛惜。后来其兄罗福成增订刊行,发表在《亚洲学术杂志》(1921—22年)上,考证出23个部首,“确立了后人研究西夏文字的方向”^⑬。

与此同时,德国人本哈第(又译为伯伦哈逊)夫人(A. Bernhardi)及查哈(擦哈)(E. von Zach)考证出12种部首,与罗氏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两位学者宣称:“余等文草成后始知罗君亦有关于斯学之作”^⑭。

1920年,罗福成根据《莲华经》、《掌中珠》残叶,选出164个部首,713个单词,写出《西夏国书类编》。罗氏兄弟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923年,伊凤阁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西夏国书说》一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不仅对西夏字,而且对西夏国、唐古特等问题都有所论及,认为西夏字是